

永生永世的爱

YUNG SHENG YONG SHIDE AI
YONG SHENG YONG
SHI DE AI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



〔俄〕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著

樊锦鑫译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

永生永世的爱

〔俄〕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著

樊锦鑫译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03号

永生永世的爱

[俄]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5.31 插页2 字数343,000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200册

ISBN 7—5407—0928—1 / I·655

定价: 7.90元

020051

А.Г.ДОСТОЕВСКАЯ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据莫斯科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出版社
1981年版译出

120000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和她的回忆录

C.B.别洛夫
B.A.图尼马诺夫

著名的俄国演员Л.М.列昂尼多夫在谈到与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会见给他留下的印象时这么说：“我见到了并听到了‘某种东西’，它什么都不像，然而通过这‘某种东西’，通过这十分钟的会见，通过他的遗孀，我感觉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百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也不会像这次会见给我的那么多。我在自己身边感到了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呼吸。我确信，在他和他妻子那里始终有着这样一种气氛……”列昂尼多夫的这番话也完全可以用于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回忆录，这篇《回忆录》在卷帙浩繁的和观点矛盾的回忆这位作家的著作中占有一席全然特殊的地位。这是一篇最令人可信的故事，事实材料经过精心的选择和核对，叙述生动，它讲述了处于创作最多产时期（1866至1881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其时这位作家写下了从《罪与罚》到《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些伟大的悲剧小说。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于1846年8月30日诞生在彼得堡的一个小官员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斯尼特金的家里。她的父亲性情随和而又乐观，年轻时酷爱戏剧、文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崇拜备至。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也是最先从父亲那里听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的。十六岁时，她读《涅陀契卡·涅兹凡诺娃》读得入了迷（家里人甚至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她“涅陀契卡”），在读《死屋手记》时，潸然泪下。还在她少女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成了她喜爱的一位作家。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母亲——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米尔托佩乌斯，一位芬兰裔瑞典人——同多情善感，不求实务的丈夫截然相反：她精力充沛，统管诸事，是真正的一家之主。父亲性格快活而坦诚，母亲——温顺又平和，这便在斯尼特金一家里建立起一种罕见的安逸愉快的环境，因此，“涅陀契卡”的韶华岁月渐渐流逝而去，一片平静，风波全无。对于未来，她还很少有所深思；在奥利欣办的当时有名的速记训练班学习时，她并不认真。但是，青年时代醉心于读书不久便注定要在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一生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866年父亲去世，家境变迁，正是在这时候，不愿在物质生活上依赖母亲的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只得操起自己所学的速记。这位速记新手被推荐给陀思妥耶夫斯基，1866年10月4日他们俩相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信中说道：“奥利欣，速记教授，给我派来了自己的一位高材生……我的速记员，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斯尼特金娜，是位年轻的，十分漂亮的姑娘，二十岁，出身良家，中学毕业，成绩优异，性格非常温和而又开朗，我们的工作干得很出色……”

独立谋生的工作紧张而又充满着令人神往的乐趣和新鲜事，她为之感到欢欣鼓舞。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自己坎坷半世的自白触动了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心，她钦佩这位作家百折不挠的天性，深刻同情和怜悯这个孑然一身，安身不稳，如此饱经忧患的人。“小说快写完时，我发现，我的这位速记员真心诚意地爱着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谈到他那非同寻常的婚事时说，“尽管关于这一点她从未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可我愈来愈喜欢她了。因为自从哥哥去世后，我苦闷至极，日子难熬，我就向她求婚……年龄相差得简直吓人（一个二十岁，一个四十四岁），但是我愈来愈深信，她将是幸福的。她有着一颗心，她是会爱的。”

对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求婚也并不是件出乎意料的事，她心里早就做了这种准备，她没有犹豫，毅然应允了，这却使她的亲友们大为不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亲属也同样如此）。所有的人无一不感到这门亲事绝对地不般配，是莫名其妙，轻率冒失的。但是，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对亲戚朋友的“入情入理”的劝告不屑一顾，以象她这样年龄的青年一代人所特有的执著和勇气拒却了规劝。后来有人问她，她怎么决意要和一个年岁比她大一半，曾经因罪服过苦役的人，一个拖牵着一大家亲眷和债台高筑的嫖夫结婚，对此，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回答说：“我可是一个六十年代的姑娘呀。”当然，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并非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六十年代的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信奉宗教的和保守主义的观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六十年代——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期所特有的振奋人心的气息也拂动了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心灵。进速记班的决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求婚所作的勇敢的，符合时代精神的回答；日

后同丈夫关于“虚无主义者”、女性的使命的争论；最后，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的大有作为的生活以及在他亡故以后孜孜不倦的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植根于六十年代，归结到“有思想的无产阶级”的伦理，归结到以独步一时的勇敢精神一反陈规陋习和成家享乐之道的一代青年的道德。

婚事一切从简，不事声张。婚后的头几个月，对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来说即是最困难的了：难于习惯和适应患有不治之症——癫痫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种异乎寻常的“病态”性格，和这位作家的亲戚之间的关系又是弄得纠缠不清。生活全然是另一种方式——神经紧张，不得安宁，混乱不堪，和斯尼特金一家的宗法生活截然不同；丈夫的前妻之子自私自利，存心不良，对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百般挑剔，毫不讲理；在许多方面丈夫还是神离心异，疏而不亲的一总之，一切都使这位少妇感到压力重重，诚惶诚恐，以至她觉得一刀两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坦率地谈到自己在那段时期的疑虑和感受：“我的爱纯粹是臆造的，理想的。还不如说这是一种崇拜和钦慕，崇拜和钦慕一位才气如此横溢和品性如此高尚的人。这是一种揪心的怜悯，怜悯一个如此饱经忧患、从未有过快乐和幸福的人……然而，这些仅都是崇高的感情、理想，已经来临了的严峻现实几乎能将它们击得粉碎。由于周围的环境，我感到一个终日百思不解、满腹疑虑的时期渐渐迫近了。尽管我是热烈地爱着他，然而一旦我确信他不再爱我，我的高傲是不会容许我再留在他身边的。我甚至想象，应该为他作出牺牲，离开他，既然我们的共同生活，看来对他说来是个沉重负担的话。”

然而，决裂、惨剧却并没有发生，这主要是由于安娜·

格里戈里耶芙娜的决心和毅力（尤为令人惊讶的是，她当时，正如她自己后来承认的那样，还完全是个小孩子）。为了改变环境，为了出国，远离这个纠葛纷纷的家庭，远离彼得堡的混乱无章的生活，她竭尽了一切努力。的确，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后来讲起出国的缘由时有些主观片面，仅仅解释为是出于挽救家庭的愿望。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在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中把这次旅行称之为迫切必需的，尽管它是沉重的一步，“主要原因有二”，他在信中对朋友说：“第一，要挽救的不仅是健康，而且甚至是生命（……）第二个原因是我的事情：债主们再也等不及了。”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也只字不提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次离开俄国时所处的惶惶不安，意气颓丧的心境。害怕轮盘赌的诱惑，恐怕在国外他不能写作，担心第一次作这样旅行的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会怎样——这些忧虑折磨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走了，可是一路上心如死灰：我并不相信出国会带来什么益处，就是说我相信国外旅行的精神影响将是极其恶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沉重的预感告诉阿·尼·迈科夫，“一个人带着年轻的妻子，她幼稚地感到欣喜，竭力想与我一起共度四处浪游的生活；可是我发现，在这种幼稚的欣喜之中有许多涉世甚浅的东西和初发的热情，这使我感到窘迫和苦恼异常，我的性格是病态的，我也预料到，她同我一起会受到极大的折磨。（注意：的确，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性格比我所知的还要坚强和深沉……）”

然而，远离彼得堡的日常生活，在德累斯顿、巴登、日内瓦、佛罗伦萨，他们却真正地亲近起来，而在出发之前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种种不幸的威胁的那种脆弱的“臆造的”恋心转变为一种严肃的感情。确信，自此以后便是永远地确

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片真挚恋情后，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以超乎寻常的勇敢和罕见的克己自持忍受命运分外慨然赐予的不幸。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使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既了解到他的激情，又了解到他的苦痛：做他的妻子——不仅意味着由于一位天才人物的亲近而能感受快乐，而且还意味着要肩挑起家庭主妇、母亲、给人以安慰的保姆和“办事员”的职责。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求极度的专心致志。经常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去的排字工长M·A·亚历山德罗夫在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时写道：“总的来说，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很善于并且是怀着一片爱心地注意保养自己丈夫脆弱的身体，正如像她自己所说的，经常让他像小孩似的穿一身‘棉’，在态度上则对他表现出温恭谦让，而这又是与高度的、颇有修养的分寸相结合的，因此，我可以满有把握地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他的一家，还包括他的为数众多的读者应该把他生命中的许多岁月归功于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沉痾痼疾着墨不多，写得很有克制，但是这反而使人更深刻地感觉到她为他生命所经受的藏于心底的痛苦和永久的恐惧。在和A·A·伊斯梅洛夫的一次谈话中，她说出了一种不仅是写，而且连想都是无法忍受的感想：“回想起我们家庭生活的时日，我觉得那就是非分而得的极大幸福的时日。可是这一幸福我有时是以极大的痛苦赎取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可怕的疾病每天都在威胁着，要把我们的所有幸福击得粉碎……这种病，您知道，既不能预防，又不能根治。我所能做的一切，这就是——给他解开领口，用手扶住他的头。可是，看着这张可亲的脸在发青，变形，一根根筋都暴胀起

来，知道他正疼得厉害，却一点也帮不了他，——这是一种痛苦，显然，我应该以这般痛苦来赎得我能与他相亲相近的幸福……。与我共同生活的那段时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身体还算是比较健康的。先前病发作得更经常，每逢发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总感到就要死了。”

在他们相识之初，陀斯妥耶夫斯基向年轻的女速记员口述《赌徒》，在这部长篇小说里也反映出这位作家自己生平中的一些特点：强烈地、发狂地、或许至死也不能克服地痴迷于轮盘赌；以及对“魔女”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一则为爱，一则为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斯尼特金娜关于小说主人公的看法之所以感兴趣并非是没有用心的。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以青年人惯有的武断丝毫不留余地指责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的柔弱性格。可是，时过不久，文学中的情景变成了现实里的情景，正是这个问题重新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年轻的妻子面前，如今已是由生活本身提出来的。

不仅是经常盈缩不定的经济来源、债务、债主使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感到苦恼之极，她更沉痛地意识到，轮盘赌是怎么无情地吸引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轮盘堡”给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发来了封封令人诧异的书信，她看着信，悲悯兼心。“啊，亲爱的，真是不该放我去赌轮盘赌的呀！”陀思妥耶夫斯基心地坦白地承认，“刚一醒来，心就紧缩，四肢就发抖发冷。”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终于还是迁就了丈夫那不幸的癖瘾。她说：“但是，我很快就领悟到了，这不是通常的那种‘意志薄弱’，而是一种将人的整个身心吞噬殆尽的激情，是某种自发的东西，甚至连坚强的性格也无能与之抗争。应该迁就它，眼睁睁地瞧着，把赌瘾看作……一种不治之症。”

然而，在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看来是一种诱惑、病态的东西，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认为这是出于他本性特征的一种特殊要求。长期的和极度的轮盘赌迷瘾以其独特的方式表现出这位艺术家变化无常，动荡激越的本性，在这里也可感到与他小说里一样的那种热情，那种狂乱。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将创作动机和“该死的幻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一封发自贝恩斯-萨克森的信中，他告诉妻子说又一次赌输了（“最后的一次教训”），陀思妥耶夫斯基谢此不幸，因为它叫他不由自主地突然生出一个解救的主意：“……虽然前不久我依稀有感，可我总还弄不清这个绝妙的主意，现在它却忽然来了！我忽然计上心来，已是九点或九点左右，正当我赌输后往林荫道上去溜达的时候（跟在威斯巴登时一模一样，那次我也是在赌输以后想出了《罪与罚》并想去跟卡特科夫接头。或命运乎，或上帝乎！）。”这样便产生了小说《白痴》，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偶然地把这部小说的紧张创作和“单一癖好”、赌博联系在一起——“跟在轮盘上一样，孤注一掷。”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本身则早就不再相信丈夫信誓旦旦的诺言，她也不相信1871年4月28日从威斯巴登寄来的表示悔改的信，但是，这封信结果确实是和“幻想”告别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得以从轮盘赌的控制下解脱出来，首先应归功于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她的宽宏大量的忍耐，刚毅和高尚的气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写道：“我要永生永世将它回忆，并每次向你，我的亲爱的，祝福。不，现在已是你的，不可分割地是你的，全部是属于你的。而在此以前，我的一半是属于这个该死的幻想的”。只是在坚决地迈出这一步之后，“连理同生”的过程才告完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以后数年的信中反反复复地说到他感到自己“粘贴”

在家庭上，甚至连短暂的离别也不能忍受。

给妻子的信件几乎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遗留下的全部书信的四分之一。正是在给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开诚相见和心地坦白的，无限地信赖她的善心和同情感。这乃是别具一格的“忏悔”，说得更准确些，是许许多多热情洋溢的，并非造作的自白，极其真切地表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个性的心灵体系。是给一位理解一切、原谅一切的至亲至爱的朋友的信。“你也是我的小孩儿，而且有时还是个撒赖的孩子；我则是你的小孩儿，也同样是个撒赖的孩子”，——他有点半开玩笑地写信给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和盘托出了真情，使他们彼此结合的主要本质为之大白。

顺便说一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信，就其本身而言，不仅使我们确信她的回忆是坦率真诚的，而且也描绘出这位作家的妻子具有超凡脱俗的人格，是上一世纪下半期俄国文明妇女的特殊典型。无论在书信中，还是在回忆录中处处都洋溢着同样一种充满爱情、彼此敬重、柔情脉脉的明净气息。远离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思念……思念得难受极了！”“我已确信，阿尼娅，我不仅是爱你，而且是钟情于你，你是我唯一的夫人，而历时十二年之后竟也仍然如此！”（引自1879年的几封信）。在他们婚后几乎十四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封封书信无一不充满着青年人的热情。

感情如此忠贞不渝，如此充实，其原因还在于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来不仅是个亲爱的妻子，富有魅力的女性，而且还是位个性鲜明，令人尊敬的人物，

是他“需要的”，“不可或缺的人”。他珍视她那“聪颖敏感而精力旺盛的天性”，她的“严整和开朗”。“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是我真正的助手和安慰者”——这些话他在给朋友们的书信和同他们的言谈中不止一次地说起。他在信中更激动地对妻子说：“让你成为一位女王，给你整个王国，我向你担保，你能比任何人治理得更好——你有那么多智慧、健全的理性、心灵和处事能力。”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有许多地方令陀思妥耶夫斯基敬仰：天赋的才能、通晓多种语言、喜好旅游、求知欲强、善于“观察和学习”，最后，还有她的速记专业——在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是一种“高级的艺术”，在某种意义上它使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成为这位艺术家的“同行”。她笃行而不倦地帮助他，忘我地和他同甘共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份自白正是献给她的。将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杰作之一献给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这不仅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挚的爱情和深深的敬意，而且还承认她对俄国文学作出了无可怀疑的功绩。谁知道呢，或许是妻子不知疲倦地操虑和用情不怠的爱赐予这位作家以创造出这部天才作品所需的几年生命。

国外旅行四年，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回来后已经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不是再象以前那样的一个姑娘，年轻、无能为力和天真幼稚，而是一个执掌诸事、不容外来干预独行其是的主妇，一个领略到生活甘苦的妇女：她在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共同生活中既饱尝了沉痛的悲哀，（初生女儿索尼娅夭折，这一不幸使夫妇益发亲密又体验到极大的幸福。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在总结国外生活经历时，忆及那段严峻而又美好的时光，感激之情溢于言表。“那些美好的岁月永远

值得感谢，那些日子我有幸在国外，几乎单独地和这位以其灵魂高洁而令人称奇的人生活在一起！”现在，她对彼得堡生活已经作好充分准备，开始采取坚决的、有步骤的办法，不让丈夫支应那些不愉快的、使之苦恼不堪的日常琐事以及十亲九眷没完没了地伸出的手。

照料孩子和理事理财并没有妨碍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生活中主要的一件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工作。她满腔热忱，废寝忘食地速记他那些小说，成为小说的头一名听众和第一个评论者。她用工整的，几乎是正规书法的字体誊抄手稿，校阅清样，处理书籍储存和销售。偶得闲暇就重读，说得确切些是第一次真正地阅读他的作品，就是那些不久前速记下来并校对过的作品。“我在旅行时总是随身带上两三部丈夫的作品，这时读它们，已经不是作为一个核对排版正误的校读者（在出版时不得不这样读），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一般的）读者。这么不慌不忙地读着，我享受到多么巨大的快乐呀，我发现原来他小说中还有这么多新鲜的、出人意料的东西。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生活越是向前，我越是更多地体验到欢乐和痛苦，就越觉得，我那难以忘怀的丈夫的作品更加深刻。”

作家和政论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的声望，《卡拉马佐夫兄弟》与《纪念普希金演说》的作者赢得的荣耀使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内心充满了快乐。丈夫取得成就，读者承认他的才华，她认为其中也有自己的一份劳动。但是荣耀也自有其相反的一面：忙忙碌碌、把这位作家紧紧包围的男男女女的崇拜者、无休无尽的拜访和邀他到文学晚会上朗读作品的约请，这占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许多时间，并不由自主地把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拖进了上流社会的晚会与交际应酬

的圈子里，而她却始终讨厌这一套，在她看来任何什么交际都不如与丈夫谈心，不如那安逸的家庭生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和葬礼的哀日里，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更是感到身为名人之妻的重负，她感到他的哀日她是熬不过去的。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意欲全身心地沉浸到悲哀之中，在这样的时刻她只是想处在亲朋好友之间，可是那些络绎不绝的代表团，那些不断向她提起“俄罗斯失去了谁”的千篇一律的无情言词使她大为恼火。

当然，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特别珍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和创作有关联的一切。丈夫的书信对她来说是格外的珍贵，依同时代人的话说，“她日日夜夜没有离开过，到处都随身携带着这些信件”。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对评论家A·伊斯梅洛夫承认道：“在信中他夸大了我的优点，不指出缺点，如同相爱者之间常有的一样，我觉得，我们之间只有保持这样的关系，人们才不会指责我过分虚荣，专好标榜等等。他在我身上所看到的，当然，是任何人所看不到的，而把爱情作如此夸张，起初我感到十分奇怪，你看，这就好似有人把您呼作‘伯爵大人’，那就会显得奇怪。自不必说，这些书信过去是，现在还是我最大的快乐和骄傲，我读着，千百遍地反复读着这些信件。”

但是，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更是精心地整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准备发表，对它们一一加以严格检查，有许多地方密实涂抹，甚至用橡皮擦净。她还在小簿子《一旦我去世或病重时》中留下一条严旨：“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给我的信，由于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学和社会意义，在我死后可以刊登在杂志上或者单行出版……我希望，刊登时要按年代顺序。倘若不能全部刊登，那末可以刊登的只是与普希金

纪念日有关的那些书信。”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极其关心的是要使他们长期的共同生活经历以理想化的和净化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所以她在同一本小簿子中执意要求销毁自己的速记日记：“……我完全不想让旁人深入了解我和费·米的家庭私生活。因此坚决要求销毁所有的速记笔记”。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出于此因，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才怀着强烈的责任感着手撰写回忆录。

长期以来，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无意撰写回忆录，同样，也不想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写给她的信。她对记者K·Я·埃廷格尔说：“我不是文学家，况且我还担心有人硬说我这么做是出于虚荣。就是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给我的信，我也认为在我死以前是不可能发表的。我个人不求虚荣。我，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孀，深得人们的爱戴和敬仰，而且贪图个人荣誉是与我格格不入的。”

同时代人中很少有人能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的隐秘之处、最本质的东西。在一些写得最有才气和引人入胜的回忆录（尼斯特拉霍夫·阿·苏斯洛娃、弗（谢）、索洛维约夫、M·亚历山德罗夫、O·波奇科夫斯卡娅）中，各持己见，大相径庭，彼此矛盾，实在令人惊讶。不禁使人产生一种印象，以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着双重的、不可捉摸的个性。

天才人物离开人世，遗留下的主要东西乃是自己的著作，其中铭印着他的智慧、激情以及心灵之伟大。然而，在某一点上，不言而喻，他始终是个秘密。今人和后人只得去猜测这个秘密，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普希金所说的一番绝妙之词一样。但是情况毕竟不同，举个例子说吧，较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把普希金看得更为严整，更为开朗。